

莎吉·朱迪特, 伦特奈尔·乔巴
(*Sági Judit – Lentner Csaba*)

匈牙利现行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孩子的税收减免和住房补贴



在发达世界, 新生儿数量的减少和生育意愿的下降是常见的现象, 即使在位于不同大陆、不同历史发展的国家也是如此, 如中国和匈牙利。这项研究调查了过去十年以生育为主题的社会人口趋势, 并提出了匈牙利的相关经济对策。作者调查了政府干预措施的变化, 重点是促进生育的政策、家庭津贴和监管政策。他们的假设是, 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与子女有关的津贴(家庭津贴、家庭创造津贴)影响母亲和生育。作者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了家庭政策干预的影响。他们的调查结果载有关于年龄组和家庭政策区域差异的相关数据, 并预测了预期的生育趋势。

《经济文献杂志》(JEL) 编码: D6、H2、I38、J11、J13、R21

关键词: 人口政策、生育、生育率、家庭支助、财政政策、中国、匈牙利

序言

从1940年在西欧, 直至1960年以来在东欧, 生育子女的意愿在不断下降(Neyer等, 2016)。自我实现的必要性、个人主义占首位的、对工作场所期望的提高以及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压制, 都影响了对孩子的养育(Oláh, 2015)。制

莎吉·朱迪特博士(Dr. Sági Judit PhD), 布达佩斯经济大学金融系讲师
(Sagi.Judit@uni-bge.hu) ORCID: 0000-0003-4197-3530; 伦特奈尔·乔巴博士(Prof. dr. Lentner Csaba)教授, 布达佩斯行政大学公共财政研究所(Lentner.Csaba@uni-nke.hu) ORCID: 0000-0003-2241-782X。

度变化造成的不确定性也对减少出生人数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些趋势导致千年之交之后¹欧洲(和匈牙利也是)的总生育率持续下降,自然生殖率为2.1(Sobotka, 2017)。从2000年到现在,欧洲总生育率的年生育率在1.46和1.58之间波动,匈牙利的这一数字在1.28和1.53之间变化(KSH, 2019)。

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在欧洲国家和匈牙利,有复杂的社会过程,背后的条件是生育意愿下降(Becker、Lewis, 1973年, De Tray, 1973年; Robinson, 1997)。传统生活形式的解体、消费社会中个人作为一个家庭的转变是一种质的变化,当然难以量化对出生的影响(Gronau, 1973; Lebowitz, 1974)。这些因素深深植根于文化,预计很难改变,但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来对其影响(Lentner等, 2017)。伊斯特林(Easterlin)(1978)和邦加茨(Bongaarts)(1978、1987)是第一个试图量化社会决定因素对生育影响的国家。模式中的自然生育率是供应变量:它指的是在没有避孕和堕胎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最大生育情况。对于先进经济体来说,计划生育(在其模式中,对生育的需求)超过了自然生育率,将其减少到生孩子的预期数量。

许多发达国家有一种将生育推迟到以后的趋势,这已被纳入低生育率的解释因素。推迟的主要原因是延长在校的时间。同时,青年人认为,生育孩子需要有适当的经济背景,即工作的存在和住房状况的解决,是其主要的因素。稳定的住房状况主要包括购置自己的住房(Spéder, 2011)。针对人口趋势,许多欧洲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家庭政策措施,以促进生育和抚养子女。从狭义上说,家庭政策可被解释为政府补贴和旨在支持照顾和抚养子女家庭的服务的结合。在这方面,现金津贴和补贴可被解释为家庭政策工具的直接形式,而减税可被解释为间接形式(Lentner, 2017)。

匈牙利的家庭政策激励措施

通过个人所得税制度,奖励措施的一部分影响到生育的开支:通过家庭减税,政府的目的是确保抚养子女的工作父母的工资不在家庭中征税。另一种激励措施是改善家庭的住房条件,支持获得自己的住房。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假定获得住房的时间对生育日期有影响:较早购置第一套住房可能导致第一个孩子的承诺倾向,之后,获得更大公寓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带来更多的孩子(Lentner等, 2017)。

税收优惠

2010年,匈牙利政府重新确定了家庭支助政策(Sági等, 2017)。2011年的家庭税收减免已成为援助计划的主要支柱之一:家庭税收减免作为生育福利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支付就业和自营收入的津贴即个人收入。根据国际税收政策决议,最合理的收入条件是津贴,因为它不是直接影响应付税款,而是税基减少(OECD, 2012)。家庭津贴可以由持有人(通常是家庭抚养者)在有受益人资格的受抚养月份之后进行验证。每月比率随着儿童人数的增加而增加:2019年,

以匈牙利平均毛收入的19.6%大约由一个子女计算, 两名子女为39.2%, 三名或三名以上子女为64.7% (表1、)。

表1、2011-2020年匈牙利家庭税收减免金额 (福林、元) (2019年1月2日, 按照官方汇率计算, 1元人民币 = 41.10福林)

	2011-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匈牙利福林						
a	62,500	66,670	66,670	66,670	66,670	66,670
b	62,500	83,330	100,000	116,670	133,330	133,330
c	206,250	220,000	220,000	220,000	220,000	220,000
人民币						
a	1521	1622	1622	1622	1622	1622
b	1521	027	2433	2839	3244	3244
c	5018	5353	5353	5353	5353	5353

备注: 每个孩子每月可减少的金额; a: 对于一个孩子, b: 两个孩子, c: 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孩子
来源: 根据税务和海关总署数据进行自我编辑

从2015年起, 家庭津贴被添加到家庭补助中。但是, 只有在应税基数只能部分由合并税基支付的情况下, 后者才能执行。不同的是, 虽然家庭减税减少了税基, 但家庭津贴减少了应付缴款的数额。将津贴扩大到个人缴费, 基本上有利于抚养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 或抚养两个孩子的单身人士。

除了生育外, 从2015年起, 它还鼓励对国家与“首批已婚人士的利益”结婚实行税收优惠。这是一个减少税收基础的优惠, 其中刚执行那年每月可折扣31,250福林 (转换人民币为760元) 而从2016年则为33,335福林 (811元)。首次结婚夫妇的折扣是至少一方第一次结婚的夫妇的折扣。这种折扣可以实行24个月, 即使是在家庭免税额之外。折扣可以集体提供, 但只能由配偶一方提供。

从2016年开始, 对个人所得税减税从16%到15%。从今年开始, 随着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税基折扣逐步增加, 税制将按比例奖励有两个孩子, 之后三个以上子女的福利。从2017年起, 家庭折扣的好处有所扩大: 家庭津贴不仅由其中一名子女和同一家庭的亲属使用, 也由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子女的父母的亲属使用。

终于, 在2019年2月宣布的家庭保护行动计划载有促进生育子女的额外激励措施。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至少生育4个孩子的妇女在生命结束前免交个人所得税。²

税收制度中的儿童生育激励措施: 以单身养育者和家庭的税负的比较 (中国和匈牙利)

区分雇主薪金毛额费用和雇员相应净津贴的税率因国家而异。家庭税收减免的收入效应见 (表2、)。

表2、2010-2017年个人所得税加上工人和雇主缴款减去现金福利, 占工资成本的百分比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中国								
a	36.1	35.0	35.0	33.9	34.0	34.2	32.9	n/a
b	36.1	35.0	35.0	33.9	34.0	34.2	32.9	n/a
匈牙利								
a	46.6	49.5	49.5	49.0	49.0	49.0	48.2	46.1
b	36.7	33.0	34.2	34.2	34.8	35.3	33.8	30.8
经合组织								
a	35.3	35.8	35.9	36.1	36.1	36.1	36.0	35.9
b	25.4	26.1	26.5	26.8	26.9	26.6	26.1	26.1

备注: a, 单身、无子女工人, 收入等于平均收入; b, 夫妇有两个应养育的子女, 一位是有工作的, 他的收入等于平均收入

来源: 自我编辑, OECD, 2018a; 2018b

在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政策中, 对家庭的税收政策减免一般都会显示出来: 与单身和无子女工人相比, 就有子女的家庭而言, 就业收入是低于税收水平 (OECD, 2012)。换言之, 鉴于有子女和抚养子女的经济负担, 有子女家庭的税负相对较低 (Leibenstein, 1975; Cullison, 1977; Nerlove, 1975)。在匈牙利, 这种分歧占主导地位, 税负较高; 家庭平均税负从30.8%到46.1%不等。中国的税收政策没有区分家庭类型, 税率统一为 32.9% (2016年数据)。

住房津贴

除家庭免税额外, 匈牙利于2012年5月15日启动了“家庭创造方案”, 其中一个要素是支持重塑新生社会政治政策。其目的是支持为还没有房子的居民建筑和购买住房的支持。另一个要素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利率补贴, 其目的是提供利息补贴贷款, 用于购买、建造和购买新公寓、购买旧公寓和使公寓现代化。住房建设利率补贴可用于购买抵押贷款延迟或被取消贷款的住宅财产, 以及剩余借款人购买较小的住房。从2015年起, 津贴范围扩大到购买旧住房。随着2016年和2018年的改革, 家庭政策的目的是使家庭福利的条件更加有利, 并有可能为抚养和承担子女的家庭提供援助计划尽可能广泛的生活范围。例如, 这些变化是父母的年龄、要购买的住房的平方米价格、公寓扩大的变化 (Sági等, 2018)。

家庭创造方案同样向那些刚刚成立家庭的和刚想要成立家庭的, 以及对那些还没有孩子的年轻夫妇、单独抚养孩子的人、对被收养者的人、对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对购买新建公寓, 新建房子, 二手房住宅或是房屋扩建的人(表3、)。

表3、家庭住宅津贴 (不用退还的国家援助; HUF福林、Yuan元; 按官方汇率计算, 2019年1月2日, 1元人民币 = 41.10福林)

孩子人数	对新房的要求	金额
建造新房, 收购新房		
1个	最少40平方米的公寓, 或70平方米的房子	HUF 600,000 (CNY 14,600)
2个	最少50平方米的公寓, 或80平方米的房子	HUF 2,600,000 (CNY 63,260)
3个, 或3个以上	最少60平方米的公寓, 或90平方米的房子	HUF 10,000,000 (CNY 243,000) 不用偿还的国家补贴 + HUF 15,000,000 (CNY 365,000) 国家补助的住房贷款
要购买、更换二手房或扩建旧房:		
1个	最少40平方米的公寓, 或房子	HUF 600,000 (CNY 14,600)
2个	最少50平方米的公寓, 或房子	HUF 1,430,000 (CNY 34,793)
3个	最少60平方米的公寓, 或房子	HUF 2,200,000 (CNY 53,528)
4个或4个以上	最少70平方米的公寓, 或房子	HUF 2,750,000 (CNY 66,910)

来源: 根据国民经济部的数据进行自我编辑

住房补贴计划的条件清楚地表明, 政府赞成建造新的住房, 而不是购买旧住房, 并为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提供了更多的援助。匈牙利制度的特点是, 援助不仅提供给已经出生的儿童, 而且如果父母承诺未来还要生育, 也会提供补贴。生育孩子的履行承诺的时限为4年, 2个子女的期限为8年, 3个或3名以上子女为10年。作为2019年宣布的《家庭保护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在第二个孩子出生时, 政府负责从父母的抵押贷款信贷中为其承担100万福林, 第三个孩子400万, 之后的每一个生育再加100万福林。由国家支付津贴。从2019年7月起, 匈牙利为已婚青年提供了生育津贴。每个40岁以下的妇女在第一次婚姻中可得到1000万福林的优惠贷款, 同样作为开启生活的部分启动贷款。生养孩子之后不需要缴付贷款的剩余部分, 生养三个孩子之后可免除偿还贷款债务。有两个子女的家庭, 如果能充分利用家庭政策福利, 可得到总额为2143万福林(家庭补助津贴 + 1000万家庭补助信贷 + 1000万福林自由使用贷款), 但条件是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形式。第二个孩子出生后, 免费使用的无息贷款暂停支付3年, 即债务的30%, 因此最终必须总共偿还1931万福林, 期限为20年。与平均利率的固定利率住房贷款相比, 这意味着1341万福林的财政优势。就有三个孩子的而言, 经济利益更加重要, 那么就有必要偿还不到2594万的市场贷款。

按住区类型分列的住房津贴

鼓励生育的福利的最新内容与农村的发展有关: 它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家庭提供更多的优惠。大多数有资格获得支助的城市是那些远离各县、在交通不

方面地位较低的城市。从2019年2月, 政府决定为该区域的家庭住房创造津贴(村舍)实行“匈牙利村落”计划。该农村家庭创造津贴计划的区域受到5000人以下定居点的影响, 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1月1日的人口不到95%)相比, 此居民人数低于2003年。这一变化的实质是: 只用于新公寓的金额(津贴), 现在可以购买、扩大有关小定居点的住宅并使其现代化使用。在生育一个孩子之后, 60万福林仍将是旧住房的家庭创造津贴之和, 但在生养两个孩子后却是由143万提高至260万福林, 生养三个孩子从220万上升到1000万福林。至少养育4名孩子的人从现在的275万到获得1千万福林的有权享受相关的定居点待遇。

表4、2019年农村家庭创造津贴(福林HUF、元Yuan, 按2019年1月2日的官方汇率计算, 1元人民币 = 41.10福林)

儿童人数	在一般城市里提供购买房子或扩大房子的补贴金额	在村落里提供购买房子或扩大房子的补贴金额
1个	HUF 600,000 (CNY 14,600)	HUF 600,000 (CNY 14,600)
2个	HUF 1,430,000 (CNY 34,793)	HUF 2,600,000 (CNY 63,260)
3个	HUF 2,200,000 (CNY 53,528)	HUF 10,000,000 (CNY 243,000)
4个, 或4个以上	HUF 2,750,000 (CNY 66,910)	HUF 10,000,000 (CNY 243,000)

来源: 根据国民经济部的数据进行自我编辑

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住房报告中, 根据匈牙利国内市场的报告, 去年我们的房价平均每平方8万福林, 这意味着1000万福林可以足以购买125平方米的家庭住房, 这无疑是对有意购买人的重大帮助。然而, 来自中心城市的人几乎不可能从中心城市搬到农村, 但这种支持更有可能帮助生活在这些定居点的大约200到250万的人, 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离开定居点, 或减缓周边地点村庄的人口增长。就住房分析人员而言, 这类农村区域的房地产市场也可以振兴起来, 特别是如果市政府的管理层也通过发展新的住宅综合体、改善服务和加强定居点来加强这些机会的话(Péli、Neszmélyi, 2015; Hegedűs 等, 2018)。这也可以改善社会流动性和促进劳动力市场(Némedi-Kollár、Neszmélyi, 2015)。村落计划最早将在2019年7月1日起可以提出申请。

最后, 在住房奖励框架内需要审查的问题是, 经济政策在设计或运作援助计划时不能忽视财政可持续性。最近的一项研究(Tatay等, 2019)调查了家庭支助系统主要支柱之一的私人家庭福利津贴的预算负担。人口统计数据以及津贴规则是计算模式的框架。根据对2020年至2040年期间这一福利的预期, 可以得出结论, 人口发展, 如出生率的演变和预算负担, 将是积极的, 匈牙利经济是以2013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平衡为特点的。

我们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结果

更多研究 (Sági等, 2017; Sági、Lentner, 2018) 还审查了达到生育年龄的年轻人的意愿是否会因家庭政策奖励而改变, 例如匈牙利是否存在住房支助计划。在2016年, 有1332名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参加了第一次问卷调查。在2018年头几个月的调查问卷中, 作者采访了全国20所最著名大学的15,700名高等教育学生中 (40% 为男性, 60%为女性) (表5、)。参加这项研究的20所大学共有174,338名全日制培训学生 (2018年数据); 这是占202,300全日制实习大学生的86.2%。该调查还代表了未来高等教育中的高收入青年 (占年龄组总人口的23.7%)。

表5、匈牙利大学的研究参与者人数

大学名称	城市	根据 NUTS 的列名	学生人数	第一次问卷答复的人数	第二次问卷答复的人数
布达佩斯经济大学	布达佩斯 佐洛埃格塞格	HU101 HU223	11,316	902	1019
布达佩斯科尔维诺斯大学	布达佩斯	HU101	10,227		921
布达佩斯技术及经济学大学	布达佩斯	HU101	19,400		1747
罗兰大学	布达佩斯 松博特海伊	HU101 HU222	23,267		2095
埃斯特哈希·卡罗伊大学	埃格尔	HU312	3554		320
国家行政大学	布达佩斯	HU101	2813		253
诺伊曼·亚诺什大学	凯奇凯梅特	HU331	2195		198
老布达大学	布达佩斯	HU101	7657		690
潘诺恩大学	维斯普雷姆	HU213	4257		383
塞麥爾維斯大学	布达佩斯	HU101	9200		829
圣伊什特万大学	格德勒	HU102	7755		698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	杰尔	HU221	7774	430	700
德布雷森大学	德布雷森	HU321	21,089		1899
考波什堡大学	考波什堡	HU232	1570		141
米什科尔茨大学	米什科尔茨	HU311	5965		537
尼賴吉哈佐大学	尼賴吉哈佐	HU323	1613		145
佩吉大学	佩吉	HU231	15,679		1412
体育大学	布达佩斯	HU101	1170		105
肖普朗大学	肖普朗	HU221	1660		149
赛格德大学	赛格德	HU333	17,347		1562
总共			174,338	1332	15,700

来源: 自己调查

在第一次调查时,我们询问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兄弟姐妹和住房状况,我们很想知道一些基本的人口特征。为了了解受访者如何考虑家庭和创造支持他们生育意愿的激励效果,我们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按其观点,新的家庭支持措施是否增加了生育孩子的心愿吗?”³,“目前创造住房的补贴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未来住房条件的发展?”第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根据73.4%的受访者,住房补贴提高了生育意愿;然而,只有36.7%的人对援助计划如果维持这种计划是否会有更多的子女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答复。在受访者中,生育一个或两个的家庭加强了援助的积极激励作用。⁴总的来说,作者的结论是,住房补贴将鼓励生育孩子的积极性。

重新调查的结果证实,75%的年轻人认为,家庭政策激励了生育的意愿。然而,只有20.9%的受访者(受访者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上次调查)回答说,如果援助继续下去,就可以再多生孩子(表6、7、)。

表6、对家庭政策激励措施的一般看法,即援助是否鼓励将生育孩子包括在内?

大学名称	确认(%)	确认(男性%)	确认(女性%)
1. 布达佩斯经济大学	75.3	74.7	75.7
2. 布达佩斯科尔维诺斯大学	72.1	71.8	72.3
3. 布达佩斯技术及经济学大学	74.7	74.7	74.7
4. 罗兰大学	73.9	72.4	74.9
5. 埃斯特哈希·卡罗伊大学	78.3	77.6	78.8
6. 国家行政大学	76.0	76.2	75.9
7. 诺伊曼·亚诺什大学	75.9	71.1	79.1
8. 老布达大学	70.7	70.3	71.0
9. 潘诺恩大学	76.1	73.1	78.1
10. 塞麦尔维斯大学	70.5	62.3	76.0
11. 圣伊什特万	73.8	70.8	75.8
12. 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	78.3	77.6	78.8
13. 德布雷森大学	73.5	72.9	73.9
14. 考波什堡大学	77.0	76.0	77.7
15. 米什科尔茨大学	77.8	76.3	78.8
16. 尼赖吉哈佐大学	77.4	74.4	79.4
17. 佩吉大学	75.2	68.8	79.5
18. 体育大学	74.0	71.6	75.6
19. 肖普朗大学	77.0	74.5	78.7
20. 赛格德大学	76.0	75.6	76.3
平均	75.0	72.8	75.9
分布	0.02049	0.03347	0.02258

来源: 自己调查

表7、对家庭政策奖励措施, 即奖励措施的看法是否计划生育孩子?

大学名称	确认(%)	确认(男性%)	确认(女性%)
1.布达佩斯经济大学	20.3	18.7	21.4
2.布达佩斯科尔维诺斯大学	19.9	19.6	20.1
3.布达佩斯技术及经济学大学	20.4	19.5	21.0
4.罗兰大学	20.8	17.5	23.0
5.埃斯特哈希·卡罗伊大学	20.1	19.2	20.7
6.国家行政大学	22.0	20.8	22.8
7.诺伊曼·亚诺什大学	21.7	20.1	22.8
8.老布达大学	22.0	18.9	24.1
9.潘诺恩大学	21.8	20.0	23.0
10.塞麦尔维斯大学	21.7	20.5	22.5
11.圣伊什特万大学	22.9	20.1	24.8
12.塞切尼·伊什特万大学	21.0	20.3	21.5
13.德布雷森大学	22.2	21.0	23.0
14.考波什堡大学	19.5	19.7	19.4
15.米什科尔茨大学	21.1	20.7	21.4
16.尼赖吉哈佐大学	19.0	18.3	19.5
17.佩吉大学	21.0	20.7	21.2
18. 体育大学	22.3	20.8	23.3
19.肖普朗大学	21.9	20.9	22.6
20.赛格德大学	22.5	22.1	22.8
平均	20.9	19.8	21.9
分布	0.01032	0.01317	0.01321

来源: 自己调查

研究结果支持了相对较高比例的年轻人不想要孩子, 即推迟生育。⁵其中主要原因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配偶(40%)与儿童有关的社会福利不足(幼儿园、托儿所、家访护士等)(38%)。请注意,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2019年2月, 家庭保护行动计划打算作出反应, 通过扩大席位, 在今后三年内完成托儿所条件的提供。如果这将实现, 从2022年, 在匈牙利所有需要养育的孩子都可以被送到托儿所。

结果显示, 住房补贴被认为对毕业后希望在中低价格居住环境中定居的受访者有利(表8、)。与此相反, 那些会在费用较高的地区购买公寓的人, 预计不会申请住房补贴。其原因是, 希望在较低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地区定居的年轻人, 要在没有银行债务的情况下购买公寓或房子, 将从家庭得到资助。在这方面, 对希望生活在更时尚的、价格较高的环境中的年轻人(例如在首都或其他先进工业区附近)就没有吸引力。(表9、)。

表8、计划居住与生育孩子意愿之间的关系 (使用 SPSS方案进行交叉表分析)

卡方测验			
	参数	自由度	双边显著性
皮尔森卡方测验	8015.757 ¹	3	0.000
连接的显著性	7615.754	3	0.000
单向联系的强度	7491.397	1	0.000
单项数	15,692		

备注: 在表格中0格包括5以下的参数。预测最小的参数为244.56。

来源: 自我研究

表9、平均生产总值/每人和平均住房价格在大学周边地区

NUTS 3	大学的编号(按照表6和表7、)	平均生产总值/每人在欧盟地区(%) (2016)	平均住房价格按平方米(CNY) (1元人民币 = 41.10福林)
HU101	1、2、3、4、6、8、10、18	136	15,338
HU102	11	54	6797
HU213	9	51	7895
HU221	12、19	92	7957
HU222	4	67	5902
HU223	1	51	5380
HU231	17	44	5621
HU232	14	41	8440
HU311	15	47	4212
HU321	13	47	7350
HU323	16	38	5069
HU331	7	51	6517
HU333	20	51	6828

来源: MNB, 2018

研究结果还表明, 住房补贴的数额不足以鼓励生育孩子, 因为这些年轻人将在较发达的大城市工作并找到居住地, 那里的住房越来越贵了。近年来, 匈牙利的房价大幅上涨, 住房市场的这一趋势不仅损害了布达佩斯住房补贴的影响, 也损害了农村城镇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 2019年2月, 匈牙利政府宣布了有区别的住房促进制度, 以鼓励在处境较不利的地区建立家庭。这项措施将使有两到三个孩子的家庭更容易在小村庄买房。去年, 约有15.2万的交易当中有3.5万个是在小村庄成交的, 但也有

一些定居点没有资格进入到该村落计划中。这意味着, 当地定居点可能发生了约2万起交易。后一种价值预计农村住房市场价格不会有明显的上涨(该楼盘仍将是负担得起的), 而对住房市场的需求预计将增加。

总结和结论

在我们的研究中, 我们分析了匈牙利采取的家庭政策措施, 以确定这些措施将如何鼓励养育孩子和年轻成年人的生活。由于影响因素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 我们无法就鼓励生育子女的财政政策的正确性或有效性表明明确立场。然而, 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激励措施的多样性, 我们表明, 匈牙利政府正在积极应对人口趋势, 并扩大可纳入支助的住房范围。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面临的挑战。财政干预的目标是明确的: 通过促进生育和教育, 维护社会健康的年龄结构。

在我们的研究中, 我们回顾了文献中认为对生育最重要的因素。今天, 欧洲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生殖所需的水平以下。在匈牙利, 自2000年以来, 人口趋势的发展比欧洲平均水平更有利。可以确定, 生育孩子的承诺受到住房情况的影响。缺乏私人公寓可能导致生育推迟参与, 实际子女人数可能低于先前的预期。购买公寓的负担, 相比必要的小公寓, 也以消极方式影响生育孩子的承诺。

2008年危机后, 匈牙利的生育率, 生育人数与以前的生育率相比有所下降。住房市场的停滞、住房建筑数量的急剧减少都受到了影响, 这导致了经济指标的恶化。2010年后, 政府还在重建家庭支助系统期间注重创造住房。然而, 经济形势只允许从2015年至今展示有效的创造家园援助计划。

根据采用调查以来实施期间的数据, 可以得出结论, 援助可能会增加生孩子的意愿, 因为许多用户将得到支持拥护。获得合适的公寓可以带来家庭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 从而为在父母的生产生活中生育孩子提供机会。在进入住所的范围较小的情况下, 更大的公寓的可能性也可以帮助家庭规划一个更大的家庭。另一个重要方面是, 获得单一房地产的现实画面可以让因经济原因离开国家去国外打工的年轻人选择。

根据我们对大学生的调查, 对家庭创作的支持显然影响了他们未来的计划。而在他们的思考中, 首先是要表明, 其他人有责任承担起生育的增长率。然而, 这表明, 环境的变化是假定的, 这也可以回到自己的思维, 至少可以考虑衡量利弊。因此, 支持创造住房可以通过短期经济刺激措施, 为人口趋势提供更有利的方向。

在我们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 通过间接激励提高产妇意愿需要时间来享受税收政策的好处。生育孩子与我们社会的费用往往与年轻夫妇的住房条件及其负担有关。在这方面, 匈牙利政府的家庭创建支助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促进了父母的购买意愿(建造住房)。家庭政策激励措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年轻夫妇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标准,无论是在家庭领域还是在国际领域。只有在改善经济条件和维护价值观(家庭作为一种价值)的同时,才能实现长期、重大的变化,后者主要受到教育和面向家庭的标准的影响。

面向家庭的公共机构的建立和可持续运作给公共财政,包括市政当局带来了沉重的负担(Lentner等,2018)。在中国家庭政策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在确定财政政策目标时,有理由依靠长期的资源供应。从197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以生育限制为代价,到如今突出了极端贫困的人口。今天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也将长期评估其影响,但已经很明显的是,尽管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预计生育孩子不会激增。抚养子女的费用,特别是上学的费用和生育对母亲事业的影响,预计也将减少匈牙利生育的人口及公共金融工具可以改善对生育的倡导,但扭转趋势需要改变家庭价值,这可能是基督教文化圈或亚洲家庭模式的良好“滋生地”在匈牙利民族的基因中,源头始于亚洲。

备注

- ¹ 总生育率是一位女性在一生中有可能活着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数,如果其生育年龄与当年的特定生育率相匹配。这样看来,这个比率代表一个假定设一代人的完成生育率。其计算方式如下:将有关年份的女性特定生育率加起来(假设所有年龄组的女性人数相同)。总生育率也用于表示生育能力。在较发达国家,2.1的比率被认为是生殖水平(KSH,2019)。
- ² 值得一提的是,有四个孩子的母亲通常在不固定的长期就业中工作。在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妇女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固定的雇佣关系中,有四个子女的比例约为25%。
- ³ 对男性和妇女的看法与这个问题几乎相同。根据15.1%的受访者的意见,所带来的福利大幅增加,57%的人认为新推出的住房支助措施并没有显著增加生育孩子的福利,19.5%的男性根本没有享受到新出台的对于生育孩子的住房支助措施,8.4%的男子无法判断这一问题。根据15.6%的妇女的需求,新推出的福利显著增加,而58.9%的妇女增加了孩子的生育意愿,但增幅不大。根据18.9%的女性受访者的数据,这些措施对生育孩子没有产生影响,另有6.6%的人无法判断这一问题。
- ⁴ 根据兄弟姐妹的数量,受访者在下一个部门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没有兄弟的人中,18.7%的人回答说“是的,非常愿意多生孩子”,48.8%的人说“是的,但不会在太大程度上”,23.6%的人说“一点也不会”,8.9%的人说“我不能判断”。有1个姐妹的14.3%是非常有效的援助效果,有效果,根据61.9%,但它是不相关的,18.7%没有附加任何效果,5.2%不能判断的问题。对于有两个兄弟的人,15.2%的人认为它是非常有效的,59.1%的人被认为是有效的,但不是很好,16.1%没有附加任何效果,9.7%不能判断它。对于有3个兄弟姐妹的人来说,援助的影响很高,为15.2%,被认为是有效的50.5%,但并不显著,28.3%对生孩子的承诺没有影响,6.1%不能判断问题。那些有三个以上兄弟姐妹的人对援助的影响为12.7%的认为非常大,56.4%被认为是有效的,但不是很大,14.5%被认为是无效的,16.4%不能判断。
- ⁵ 按性别分列,我们没有发现各群体之间有任何重大差异。在新推出的住房支助制度的影响下,9.7%的男性受访者认为生的孩子比计划的多,46%的人不考虑,31.6%的人认为对生育有潜在的影响。12.7%的男性无法判断这个问题。在女性受访者中,7.1%的人

认为她们肯定会影响新措施中的生育人数, 26.1% 的女性受访者认为有可能影响新的住房资助制度的状况。根据59.1%的人, 不会对新推出的儿童优惠产生影响, 7.7%的女性受访者无法判断这个问题。根据他们兄弟的人数, 我们得到了以下比率。在没有兄弟的人中, 9.4% 的人回答说, “我不能判断”。按照这种模式, 他们回答说, “是的, 肯定” 24.6%说“是的, 这是可能的”, 55.2%说“肯定不是”和 10.8%。有一个兄弟的比例是: 5.5%、26.9%、59.3%、8.3%。有两个兄弟的: 10.7%、33.2%、45.1%、11%。有三个兄弟的: 8%、35%、48%、9%、而有三个以上的兄弟姐妹的人: 12.7%、23.6%、43.6%、20%。

参考文献

- Becker, Gary S. – Lewis, H. Gregg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 No. 2, 279–288, <https://doi.org/10.1086/260166>. 盖瑞·贝克·格雷格·路易斯(1973年)《儿童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政治经济学杂志》81(2): 279-288
- Bongaarts, John (1978):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4, No. 1, 105–132, <https://doi.org/10.2307/1972149>. 约翰·邦格斯(1978年)《分析生育率近因决定因素的框架》《人口与发展评论》4(1): 105-132
- Bongaarts, John (1987):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 9, No. 3–4, 243–260, [https://doi.org/10.1016/0160-791X\(87\)90003-0](https://doi.org/10.1016/0160-791X(87)90003-0). 约翰·邦格斯(1987年)《生育率的近似决定因素》《社会中的技术》9(3-4): 243-260
- Cullison, William E. (1977):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Com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1, No. 2, 345–348, <https://doi.org/10.2307/1885422>. 威廉E.·卡利森(1977年)《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理论: 评论》《经济学季刊》91(2): 345-348
- DeTray, Dennis N. (1973): Child Quality and the Demand for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 No. 2, 70–95, <https://doi.org/10.1086/260154>. 丹尼斯·迪崔(1973年)《儿童素质与对儿童的需求》《政治经济学杂志》81(2): 70-95
- Easterlin, Richard A. (1978):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Fertility. A Synthesis. In: Tilly, Charles (ed.):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57–133. 理查德A.·伊斯特林(1978年)《生育的经济学和社会学》A Synthesis查尔斯·堤利编辑的《生育率变化的历史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普林斯顿, 57-133
- Gronau, Reuben (1973):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the Housewife's Value of Ti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1, No. 2, 168–199, <https://doi.org/10.1086/260160>. 鲁本·格罗瑙(1973年)《孩子对家庭主妇时间价值的影响》《政治经济学杂志》81(2): 168-199
- Hegedűs Szilárd – Novoszáth Péter – Molnár Petronella (2018): A Modern Városok Program költségvetési forrásainak vizsgálata, különös tekintettel a regionális politikára. *Comitatus*, 28. évf., 230. sz., 75–83. 海盖迪什·西拉德、诺沃斯特·彼得、摩尔那尔·彼得罗妮拉(2018年)《审查现代城市方案的预算资源, 特别是关于区域政策的预算资源》匈牙利《Comitatus》杂志 28(230): 75-83
- KSH (2019): *Teljes termékenységi arányszám (1990–2016)*. Központi Statisztikai Hivatal, www.ksh.hu/docs/hun/eurostat_tablak/tabl/tsdde220.html.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2019年)《总生育比值》(1990年至2016年)匈牙利中央统计局

- Leibenstein, Harvey (1975):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9, No. 1, 1–31, <https://doi.org/10.2307/1881706>. 哈维·雷本斯坦 (1975年) 《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季刊》89(1): 1-31
- Lelbowitz, Arleen (1974): Home Investment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2, No. 1, <https://doi.org/10.1086/260295>. 阿琳·莱博维茨 (1974年) 《家庭对子女的投资》《政治经济学杂志》82(1)
- Lentner, Csaba (2017): Scientific Taxonomy of Hungarian Public Finances After 2010. *Polgári Szemle / Civic Review*, Vol. 13, Special Issue, 21–38, <https://doi.org/10.24307/psz.2017.0303>. 伦特奈尔·乔巴 (2017年) 《2010年后匈牙利公共财政的科学分类》匈牙利《公民评论》杂志 13(特刊): 21-38
- Lentner Csaba – Sági Judit – Tatay Tibor (2017): A magyar családtámogatási rendszer prioritásai. *Acta Humana*, 5. évf., 3. sz., 37–46, <https://folyoiratok.uni-nke.hu/document/nkeszolgáltato-uni-nke-hu/WEB-Acta-Humana2017-3-03-T-Lentner-Sagi-Tatay.pdf>. 伦特奈尔·乔巴·莎吉·朱迪特·塔塔伊·蒂博尔 (2017年) 《匈牙利家庭支助系统的优先事项》*Acta Humana* 5(3): 37-46
- Lentner, Csaba – Nagy, László – Vasa, László – Hegedűs, Szilárd (2018):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Slovakia –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Hungarian Atypical Features. *Economic Annals*, XXI, Vol. 173, No. 9–10, 10–18, <https://doi.org/10.21003/ea.v173-02>. 伦特奈尔·乔巴·纳吉·拉斯罗·瓦萨·拉斯罗·海盖迪什·西拉德 (2018年)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对地方政府任务和供资制度监管的比较分析, 特别注意到运营的可持续性》《经济年鉴》173(9-10): 10-18
- MNB (2018): *Lakáspiaci jelentés*. Magyar Nemzeti Bank, 2018. november, www.mnb.hu/kiadvanyok/jelentesek/lakaspici-jelentes/lakaspici-jelentes-2018-november. 匈牙利国家银行 (2018年) 《住房市场报告》匈牙利国家银行, 2018年11月
- Némedi-Kollár, Kitti – Neszmélyi, György Iván (2015): Aspects of Spatial Economic Processes of Disadvantaged Areas in Hungari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Romanian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Vol. 11, No. 2, 3–18. 内梅迪-科勒·基蒂·内斯梅伊·哲尔吉·伊万 (2015年) 《从匈牙利和国际视角研究贫困地区的空间经济过程》《罗马尼亚区域研究评论》11(2): 3-18
- Nerlove, Marc (1975): *Economic Growth and Population: Perspectives of the “New Home Economic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ttp://library.isical.ac.in:8080/jspui/bitstream/10263/5128/2/marc%20nerlove%20speech%20type.pdf>. 马克·内罗夫 (1975年) 《经济增长与人口: “新家庭经济学”的视角》西北大学
- Neyer, Gerda – Thévenon, Olivier – Monfardini, Chiara (2016): *Policies for Families: Is There a Best Practice?* European Policy Brief, https://ec.europa.eu/research/social-sciences/pdf/policy_briefs/policy_brief_families-and-societies_122016.pdf. 格尔达·尼耶·奥立弗·提维弄·基娅拉·蒙伐尔蒂尼 (2016年) 《家庭政策: 是否存在最佳实践?》欧洲政策简介
- OECD (2012): Special Feature: Trends in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Employe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Schedules. In: *Taxing Wages 2011*.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tax_wages-2011-3-en. 经合组织 (2012年) 《专题: 个人所得税和雇员社会保障缴款计划的趋势》发表于《2011年工资征税》经合组织出版社, 巴黎
- OECD (2018a): *Taxing Wages 2018*.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s://doi.org/10.1787/tax_wages-2018-en. 经合组织 (2018年) 《工资征税, 2018年》经合组织出版社, 巴黎

- OECD (2018b): *Taxing Wages 2016-2017*. Associated Paper: Selected Partner Economies (Brazil, China, India, Indonesia and South Africa). OECD Publishing, Paris, www.oecd.org/tax/tax-policy/taxing-wages-selected-partner-economies-biics-2018.pdf. 经合组织 (2018年) 《2016-2017年对工资征税》相关文件: 选定的合作伙伴经济体 (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 经合组织出版社, 巴黎
- Oláh, Livia (2015): *Changing Famil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amilies and Societies Working Paper*, 44, www.un.org/esa/socdev/family/docs/egm15/Olahpaper.pdf. 厄拉·莉维亚 (2015年) 《欧盟家庭的变化: 趋势与政策影响》《家庭与社会工作论文》44
- Péli, László – Neszmélyi, György Iván (2015): Territorial Differences of Rural 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Hungary. *Romanian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Vol. 11, No. 2, 69–84. 佩利·拉斯罗·内斯梅伊·哲尔吉·伊万 (2015年) 《匈牙利乡镇地域差异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罗马尼亚区域研究评论》11(2): 69-84
- Robinson, C. Warren (1997):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Over Three Decade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1, No. 1, 63–74, <https://doi.org/10.1080/0032472031000149736>. 鲁宾逊C.沃伦 (1997年) 《三十多年来的生育经济理论》《人口研究》51(1): 63-74
- Sági, Judit – Tatay, Tibor – Lentner, Csaba – Virág, Ildikó (2017): Certain Effects of Family and Home Setup Tax Benefits and Subsidies. *Public Finance Quarterly*, Vol. 62, No. 2, 171–187, www.asz.hu/storage/files/files/public-finance-quarterly-articles/2017/sagi_2017_2_a.pdf. 莎吉·朱迪特、塔塔伊·蒂博尔、伦特奈尔·乔巴、维拉格·伊尔迪科 (2017年) 《家庭和家庭设置税收优惠和补贴的某些影响》《公共财政季刊》62(2): 171-187
- Sági, Judit – Lentner, Csaba (2018): Certain Aspects of Family Policy Incentives for Childbearing. A Hungarian Study with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Sustainability*, Vol. 10, No. 11, <https://doi.org/10.3390/su10113976>. 莎吉·朱迪特、伦特奈尔·乔巴 (2018年) 《鼓励生育的家庭激励政策的某些方面, 国际视野下的匈牙利研究》《可持续性》10(11)
- Sági, Judit – Lentner, Csaba – Tatay, Tibor (2018): Family Allowance Issues. Hungar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Countries. *Polgári Szemle / Civic Review*, Vol. 14, Special Issue, 290–301, <https://doi.org/10.24307/psz.2018.0419>. 莎吉·朱迪特、伦特奈尔·乔巴、塔塔伊·蒂博尔 (2018年) 《家庭津贴问题, 匈牙利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匈牙利《公民评论》杂志 14(特刊): 290-301
- Sobotka, Tomáš (2017): Childlessness in Europe: Reconstructing Long-Term Trends Among Women Born in 1900-1972. In: Kreyenfeld, Michaela – Konietzka, Dirk (eds.): *Childlessness in Europe, Contex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Springer, Dordrecht, 17–53,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44667-7_2. 托马什·索博特卡 (2017年) 《欧洲无子女现象: 重建长期的趋势在1900-1972年出生的女性中》发表于麦克拉·克莱恩费德、德克·克尼茨卡 (合编) 《欧洲的无子女现象、背景、原因和后果》施普林格出版社, 多德雷赫特第
- Spéder Zsolt (szerk.) (2011): *Demográfiai jövőkép. Magyarország demográfiai jövőjét meghatározó tényezők alakulásának áttekintése és értékelése a fenntarthatóság szempontjából*. KSH Népeségtudományi Kutató Intézet, Budapest. 什佩德尔·泽索特 (编辑) (2011年) 《人口愿景. 审查和评价界定匈牙利人口未来可持续性因素的演变情况》中央统计局人口研究所, 布达佩斯
- Tatay Tibor – Sági Judit – Lentner Csaba (2019): A családi otthonteremtési kedvezmény költségvetési terheinek előreszámítása, 2020–2040. *Statistikai Szemle*, 97. évf., 2. sz., 192–212, <https://doi.org/10.20311/stat2019.2.hu192>. 塔塔伊·提波、莎吉·朱迪特、伦特奈尔·乔巴 (2019年) 《预测2020-2040年家庭设置福利津贴的预算负担》《统计评论》97(2): 192-212

- Wang, Eileen – Hesketh, Therese (2018): Exploring Women’s Decisions About Childbearing After the Lifting of the One-Child Policy.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Vol. 20, No. 11, 1230–1243, <https://doi.org/10.1080/13691058.2018.1424352>. 王艾琳、特蕾莎·赫斯基 (2018年) 《探讨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后女性生育的决定》《文化, 健康与性》20(11): 1230-1243
- Wang, Feng – Mason, Andrew (2007):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s, Mexico City, 141–154. 王丰、安德鲁·梅森 (2007年)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涉社会和经济问题专家组会议, 墨西哥城
- Zeng, Yi – Hesketh, Therese (2016): The Effects of China’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The Lancet*, Vol. 388, No. 10054, 1930–1938,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405-2](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405-2). 曾毅、特蕾莎·赫斯基 (2016年) 《中国普遍允许二孩政策的影响》《柳叶刀》388(10054): 1930-1938